

界的力量消长,还在于更多新的跨国议程的出现,以及更复杂的国际体系的建构。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中,如何给中国定位、确定我们需要什么、反对什么,以及如何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同时,实现与其他国家的多赢,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严峻考题。

所谓“乱”,是指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形势发展趋势的不确定。与认为危机已经过去的乐观态度相悖,随着有可能引燃世界范围贸易战、货币战的美联储二次宽松政策的出台,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二波探底似乎越来越近。今年的 G20会议与 1933 年伦敦会议有几分相似——世界各国开始各说各话和相互攻击。抵御金融危机的全球共同努力,逐渐被以邻为壑的冰水所浸没。发达国家之间、新兴国家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矛盾,正在孕育或已爆发。原有的联盟被打破,新的联盟尚未成型,“遏制对象”要“同舟共济”,而“战略伙伴”又成为“战略对手”,国家关系一年一变或一年数变,一切都在未定之天。世界进入号角不定的乱局。

所谓“难”,是指国际关系中积累了大量难以解决的矛盾。目前世界体系的基础是雅尔塔体系和冷战后格局的延续,其中存在许多历史纠葛和利益冲突。如中国与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中日钓鱼岛争

议、中美经济关系失衡、美元体系缺陷等等。在承平年代,这些矛盾和问题被掩盖和搁置,到格局发生变化和危机时期就开始冒头。目前的两难是,真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还有很大难度,但要继续留待时机成熟时再着手解决,当事方似又有些于心不甘。

所谓“险”,是指中国面对的战略环境存在凶险的一面。从世界范围看,中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从洋务运动开始,中国在历史上有多次中途夭折的现代化努力,其原因就是没有把握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或疏于内政、或失于外交、或缺少军事准备,结果在严酷的竞争中列强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打败,逆转了现代化进程。目前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重大成就,也积累了许多重大矛盾,国内改革处于攻坚阶段;而从全球角度看,我们又处于全球性的危机时代,一个国际体系的重大转型期。稍有不慎,还有可能重蹈覆辙。因此,对战略环境中存在的巨大风险,我们不能不高度重视。

对我们来说,认识战略环境可使我们避免陶醉于八方赞誉、陷入形势一派大好的飘飘然之中,也可以使我们摆脱四面皆敌、风雨如晦的负面判断。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同样,认识战略环境就是为了适应环境,并创造条件去营造有利于中国发展的环境。○

## 中国当前外交环境及应对

陈 岳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当前,中国外交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如何评判和应对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的外交战略问题,而且关乎中国的发展,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形势。

中国外交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中美关系仍旧处于争吵——缓和——再争吵——再缓和的周期性波动状态,但不是死循环,而是在螺旋式上升。美国的战略重心正逐步转向亚太地区,中国的压力明显增大。二是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因为国家利益交锋和摩擦出现了新的紧张,特别

是钓鱼岛附近海域撞船事件之后两国矛盾和冲突升温。三是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更加复杂化。在南海问题上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存在争议,中国与印度的关系也频频出现不和谐音。

中国外交环境的上述变化是否说明:我们的外交环境正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或者说比前一时期更糟糕了?中国外交正面临着近 30 年来最紧张的时期?我认为并非如此。

中美之间的问题基本上是老问题,售台武器、贸

易与汇率、涉藏涉疆及海洋权益等问题长期存在,并未比以前更加恶化。至于美国战略重点的调整也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日之间的变化主要是在钓鱼岛问题上出现了中国渔船被撞和船员被扣事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对抗行为。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基本上仍然是延续以往的基本态势,没有出现根本性恶化局面。

可见,中国与部分西方大国和少数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确实出现了新情况和新困难,但中国外交的基本态势仍然得到维持,局部地区还有所突破,如中欧关系等。正确的判断是:我们的外交环境是有变化,但没有更加恶化。我们仍处于和平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本来就不仅有机遇,而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危机与希望同在。关键是我们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化解危机,赢得希望。

那么,中国外交环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出现了新的调整 and 变化。一是国际体系在世界性金融危机之后发生变化。在这场金融风暴引发的经济危机冲击下,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发展受到重挫,相对优势进一步缩小,美国领导世界的信心和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中国与新兴发展中大国群体崛起,中国和平崛起的速度不断加快,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各种力量正在加速分化组合,大国关系正在经历不同以往的大幅度调整。多极化趋势和轮廓更加明显和清晰。二是国际制度出现了新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伴随着国际体系结构性权力的变化而出现的,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旧的国际制度安排进行调整,如联合国体制内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得到重视,联合国自身在进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增资扩股,新兴大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增大。另一方面是以新的国际制度来替代或补充旧的国际制度。G7发展到G20,金砖四国、基础四国、亚欧首脑会议各显神通,新的地区合作机制如10+3和10+N,上海合作组织等日益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在新的安排中,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日益增强。

第二,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的变化必然引起一

些国家的强烈反应。上述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出现的新变化对传统大国的现有权势产生冲击,同时体制内的中小国家也有一个如何适应的调整期。传统大国担心既有地位的丧失,总是想方设法延缓或阻止新兴大国的崛起;一些新兴大国也有意取而代之,竞争心态复杂;一般中小国家担心原有平衡被打破,在新平衡建立过程中会付出更大的代价,等等。

出于这样的考虑,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与中国利益相关的世界各国不得不做出相对仓促和自然反应式的应对,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许多与中国和平发展进程相悖的政策和行为。我们对此应有充分的思想准备。换句话说,在中国崛起和国际体系变化的过程中,中国对外关系不可避免地将要面临新一轮的震荡期和摩擦期,这是不以中国的意愿为转移的。与其躲躲闪闪,不如勇敢面对、妥善解决。

因此,当前中国外交的首要课题是回答如何应对上述变化和 challenge 的问题。从历史事实出发,基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根本目标,面对上述外交环境变化和 challenge,中国尤其要做好以下方面的工作。

首先,在大的原则上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战略思维。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问题。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并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并不会因为强调某一方面而导致否定另一方面。韬光养晦并不是某种对外政策的具体内容,而是在制定对外政策时表现出的一种内敛、低调、务实、谨慎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有所作为是对外交政策和外交行为的成效进行评判的要求,也是外交工作的总体要求。韬光养晦的核心就是做事低调,不要锋芒毕露。韬光养晦是一种文化,一种心态,一种处事原则,一种战略指导思想。因此,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一事无成。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完全可以相辅相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还是要坚持韬光养晦,在战略机遇期要这么做,即使过了这一时期还是要坚持这么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家特性所决定的。

其次,不宜将核心利益具体化而使自己处于被动局面。核心利益就是国家的根本利益。按摩根索的说法,国家利益包含两个要素,一个是逻辑上要求

的,即在逻辑意义上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个要素是由环境决定的,是可变的。因此,前者具有相对永恒的存在必然性,后者则依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相对永恒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的“内核”,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国家的生存。国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其生存的内涵应当包括国家领土、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完整性。

2009年7月,戴秉国国务委员曾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概括了中国的三个核心利益:一是维护基本制度和国家安全;二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可见,核心利益是国家生存的底线,核心利益本身是逻辑规定的,永恒不变的,由此决定了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具体的利益则表现为依环境而变化的那些具体的国家权益。核心利益具体化既不符合

逻辑,在实践中也经常会导致自相矛盾,使自己处于被动。第三,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要做到有底线、有原则、看大局、看长远。这也是韬光养晦原则的具体体现和要求。在国际体系和国际制度调整变化的关键时期,中国与世界其他大国及周边国家的利益关系将变得更加复杂和敏感。可以说,战略机遇期的后半段将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利益交错的摩擦期和震荡期。当然,这种利益的摩擦和碰撞不一定会否定相互间的合作,而更多的是竞争中的合作或合作中的竞争。因此,处理这些日益增多的利益摩擦必须从大局出发,从长远着眼,不为一时一事而丢掉既定原则,更不能以感情替代理智而意气用事、忙乱应对,要有定力,要自信。惟有如此,才能化解危机,抓住机遇。○

## 中国大外交:当代问题与传统智慧

李永辉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2010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在国际格局深刻变化,新兴大国迅速崛起,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国际影响力空前增强,外交形势总体向好的背景下,中国外交却在这一年里遭遇了一连串麻烦,甚至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这一现象令人深思。

中国外交面临的新挑战主要来自中美关系及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就中美关系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作为当今世界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和潜在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双方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战略互信下降。其二,在此背景下,美国警惕和制衡中国的一面开始上升,战略重心加速东移。其三,美国对华政策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原有的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联盟出现分化。具体表现为:传统上在对华关系方面比较理性和积极的精英层对中国的态度趋向消极甚至是情绪化;被称为对华关系压舱石的商界对中国的传统支持正在明显削弱;一直在双方关系中发挥稳定和有效沟通作用,被称作中国人民老朋友的老一代知华和亲

华派正在淡出舞台,而可以发挥替代作用的新一代尚未出现。结果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大幅调整,高调重返亚洲,与盟国、除中国外的新兴国家及区域组织的关系都得到了明显的加强。就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而言,由于“天安号”事件和黄海军演问题,中韩关系趋冷,而韩美关系则得到了明显加强;钓鱼岛撞船事件后,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两国民间敌对情绪迅速激化,与此同时,因普天间机场搬迁等问题而饱受困扰的日美关系不仅迅即解困,而且得以全面提升;受南海问题影响,在越南等与中国存在岛礁和领海争端国家的推动下,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警惕和防范心理加剧,借美防华成为其外交和安全上的重要选项,这在东盟欢迎美国回归东亚,包括支持美国成为东亚峰会成员国等问题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中国外交如何应对,是一道难题。首先,应该看到,从根本上说,这是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在成长道路上难以避免的成长烦恼。因此,要从容应对,不必过于紧张,更不必惊慌失措。